

编者按

生活如奔涌向前方的河流，纵有无常，亦不停歇。无论境遇如何，不依附、不盲从，在时代洪流中守住本心、寻得方向，便能活成照亮自己的“光”。本期精选两篇书评，于不同时空图景中，看见跨越时代的女性担当与力量。

《王船山》中的女性： 在明末清初的烽火里，活成自己的光

文 / 向柯树 王林洲

在明末清初的动荡年代，历史长卷中往往镌刻着英雄豪杰的丰功伟绩，而普通女性的命运却如暗夜流萤，隐没于宏大叙事的边缘。聂茂的长篇小说《王船山》，以锐利视角勾勒出鲜活的女性图景，她们不再是陪衬，而是有尊严、有智慧、有勇气的“自我”，或在家庭崩解时撑起天地，或在命运枷锁中奋力抗争，或在精神废墟上寻找宁静，甚至敢对“英雄”“王朝”的固有定义发出质问。她们如穿越时空的光，照见了女性的坚守，也引发了当下的我们关于尊严与觉醒的深层思考。

传统美德里的她： 是家庭的“脊梁”

提起传统女性，人们常想到“温顺贤良”“逆来顺受”的刻板印象，而《王船山》赋予其超越伦理教化的复杂维度：“传统美德型女性”用行动重新定义了“贤德”，她们的温柔与坚韧里藏着智慧与担当，在时代夹缝中以“拿主意”的姿态守护亲人与信念。王船山的母亲谭孺人，便是这样一位“有主见的贤妻良母”；丈夫王朝聘谋官失利后陷入消沉，谭孺人没有一味劝勉，更没有抱怨，而是私下筹措资金，悄悄为丈夫打点。她一句“去了，未必位列朝中；不去，就一定不会位列朝中”点醒了丈夫，“私下筹钱”的举动既维护丈夫尊严，也主动谋划家庭未来——她用女性的细腻与果敢，成为家庭决策的“隐形推手”。

张纯熙的妻子胡三妹，则在绝境中诠释“坚韧”。丈夫反抗压迫惨死后，留下两个幼子和一间空屋。她强忍悲痛，找亲戚合伙开小餐馆维持生计。她深知读书才是孩子的出路，便恳求王夫之收子为书童。即便她最终因孩子夭折耗尽生命，但这份前期的坚韧已足够震撼人心。此外，王船山的妻子陶孺人、郑若兰，以及素未谋面的奚采诺，或默默操持家务，或在战乱中守护家人安危，或自主承担夫家责任。聂茂在塑造这些形象时，没有将她们写成“丈夫的附属品”，而是突出“主体性”。她们的付出不是“义务”，而是彰显“选择”；“贤德”不是为了迎合男性话语，而是源于对家庭、对亲人的深情与责任，“不怨不尤”的态度则暗含对时代悲剧的超越性理解。

困境中抗争的她： 在黑暗里独立劈路

时代变迁下，“温顺贤良”早已无法承载女性对自我的追求。以姜善棋为代表的“勇敢独立型女性”是命运的“叛逆者”，用智慧与勇气捍卫尊严，挣脱“他者”标签，活成自己的“主体”。

姜善棋父母双亡后，流落湘春楼，凭借一手好琴艺和清醒的头脑，在风月场中筑起一道“尊严的墙”。后来落入桂王府，她被当作“玩物”控制、囚禁押送，却从未被打垮。在波谲云诡的宫廷斗争中，她“时时留意、处处小心”，不外露锋芒却暗蓄力量，面对仇家她压下仇恨，精心布局，最终成功复仇。

姜善棋的“独立”，不是鲁莽的反抗，而是“审时度势后的坚守”。她懂得在逆境中“藏”，却从未忘“守”——守住尊严与对自由的渴望。她没有依靠任何人的“拯救”，而是靠自己的智慧在黑暗里劈开一条路。

追寻精神世界的她： 在庵堂里找到“自我的自由”

《王船山》中的女性，不仅有“向外抗争”的勇气，更有“向内探索”的觉醒。在明末清初的动荡中，她们没有选择“世俗的抗争”，而是转向精神世界的追寻——走进庵堂不是“逃避”，而是在时代局限下寻找“心灵的栖息地”，以“超脱”姿态实现对“自我”的掌控。

水月庵住持玄静师太，便是这样一位“精神上的自由者”。她“不喜不惧、不恩不仇”，似已斩断尘世羁绊，直到与姜晓书的深夜长谈，其过往才被揭开：她曾是李自成的爱妃，李自成死后，她落入仇家手中，遭受身心折磨，逃亡中又遇到山贼险些丧命，最终在水月庵停下脚步。她不是“看破红尘”，而是在历经沧桑后找到了“不为他人定义”的宁静。她不再是“李自成的爱妃”“程九伯的囚徒”，而是“玄静”——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。

姜晓书的选择亦是“自我救赎”。她在青灯古佛旁诵经修行，不是“放弃生活”，而是在精神世界里重建“自我”，不再为他人眼光、世俗标准痛苦。当姜晓书接任住持，她接过的是庵堂的钥匙，更是“坚守自我”的精神传承。

敢说“逆耳言”的她： 以清醒照见时代的荒诞

欧阳文澜或许不是《王船山》女性群像中最“耀眼”的，却是最“振聋发聩”的。初次登场时，欧阳文澜是个“活在痛苦里的母亲”：丈夫姜百户守城战死，女儿姜百合精神恍惚，儿子姜燕吉是个痴儿。她不懂什么家国大义，只知道：丈夫为守城而死，家人却要东躲西藏；明朝政府从未给予任何嘉奖，反而因丈夫“抗敌”的身份迫害她；倒是清政府给了她一笔抚恤金，让她一家生活得以稳定。

“让每个普通人过上正常日子，让每个流血的人，甚至牺牲者得到应有的尊重……这就是民心所向的好政府”，她的“清醒”不是“没有气节”，而是基于“生存”的真实，解构了传统历史叙事中“气节高于民生”的虚妄，也印证了历史温度终究体现在对普通人性命运的关照。聂茂塑造欧阳文澜，或许是想通过“普通女性”的视角，让读者看到历史的另一面：那些被宏大叙事忽略的百姓苦难，那些被“气节”掩盖的生存渴望，那些敢说“逆耳言”的底层智慧。

《王船山》中的女性群像，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明末清初的烽火岁月，更是女性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。这些在烽火中活成“光”的女性，早已超越了历史的局限，让我们相信无论身处何种境遇，都能守住尊严、找到方向，活成自己的“主体”。因为女性力量，从来都不逊色于任何时代的风浪。

（作者简介：向柯树系中共株洲市委党校博士；王林洲系哈尔滨音乐学院研究生）

在《看不见的河流》里 寻找心灵深处的渡口

文 / 吴丹

当文学作品回归对生活本真的书写时，往往更能触动人心。李娃的中短篇小说集《看不见的河流》便是如此，于平凡叙事中照见救赎的可能。她的小说多与水相关，水既能承载世间万物，又能为生活迷茫的人指引方向。故事里没有世俗意义上的“成功者”人设，多是现实中难以纾解苦闷的失意人群。李娃从女性独特的叙事视角出发，留心观察并记录他们不同装束下的隐私心事，用深邃而绵密的语言，娓娓讲述那些在水畔流转的故事，既有现实困境的沉重，更有自我救赎的微光。每个结尾几乎都留有悬念，就像我们的生活没有标准答案。

作为书中首个中篇，《春山》以洞庭湖狭长岛屿“春山”为舞台，围绕“上山客栈”的三位人物展开：与前男友分手、和父母闹僵的实习生“我”（高美佳），接管母亲与继父旅馆的老板唐毅，以及怀揣秘密登岛的堂姐鲁娜。因父辈误会与自身境遇不顺，“我”对优秀漂亮的鲁娜心生芥蒂。三人立场迥异的相遇，在岛上交织出别样的命运轨迹。

然而，鲁娜的婚姻早已千疮百孔，身心受创的她不仅要挣脱不幸的婚姻枷锁，更要阻止利欲熏心的丈夫开发春山——那是会破坏生态、违背父亲心意的计划。复仇对象未如期登岛，恰逢客栈遭歹徒骚扰，鲁娜挺身而出，设计惩戒施暴者，这份从个人救赎延伸至守护家园的初心，让她的行动兼具正义性与必然性。而唐毅与母亲的疏离、“我”的青春迷茫，也在这次三人患难与共的相处中，自愿敞开心扉放下过去的成见：“我”承认了鲁娜“姐姐”身份，唐毅坚守客栈，鲁娜寻得新生。此时，“春山”不再只是单纯的地理符号，更成为三人命运转折的精神地标。《春山》让我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光与热的相互辉映，譬如他们三人自救亦互救，于迷茫痛苦中绽放各自本真的光与热，照亮别人温暖别人的同时，也将自己缺憾的时刻照亮捂暖。

另一中篇《白渡口》则聚焦都市女性的职场与情感困境。女主角武樱宁与初恋男友相识八年，却深陷灵魂不契合的倦怠，抵触男友介绍的工作，也因缺乏共同语言迟迟未步入婚姻，这段关系也成了她心头沉甸甸的“习惯”。偶然遇见成熟男子郑施尔，她陷入“安稳陪伴”与“心跳悸动”的两难，不知如何处理情感关系的她以嗜睡、狂热沐浴麻痹自己。彼时郑施尔妻子因病已深度昏迷多年，这段特殊状态成为两人间的无形屏障。郑施尔妻子离世后，情感障碍看似消除，但好友小植的爱情悲剧让她更添迷茫。直至陌生女人的指点点醒了她，武樱宁决心“去做喜欢的事”，从冲冲洗洗的颓废生活中走出来。

一次应急帮忙让她重拾闲置多年的画笔，心仪的工作也随之而来。她终于正视内心：不适合的人与事，再光鲜也无需将就。这篇小说恰似一面映照现实的镜子，写尽了被习惯裹挟的迷茫——太多时候，我们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养成惯性，渐渐忽视了活着的真正意义，对生活抱着“得过且过”的敷衍态度。而当我们的自我意识猛然觉醒，鼓起勇气重新审视当下的生活，便会发现：那些被压抑的热爱、被搁置的期待，从未真正消失，正如武樱宁重拾画笔那般，只要愿意打破惯性，勇敢迈出第一步，终究能追寻到自己想要的幸福。

在《看不见的河流》的12篇中短篇作品中，李娃聚焦当代普通人的生存压力：爱情亲情的辜负、无常遭遇的碾压以及困境中的突围与抉择。她化身冷静的旁观者，记录不同人群的喜怒哀愁与现实困境，却又在字里行间注入温度——那些“不轻信、不依附，敢于与过去告别”的人物，恰是人性之美的生动注脚。